

【书 评】

西藏问题的近代迷思¹

书评: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By Hsiao-ting Lin. Vancouver, Toronto: UBC Press, 2006, pp. XV+285.

ISBN-13: 978-0-7748-1301-3 ISEN-10: 0-7748-1301-6

袁 剑²

在中国历史中，关于边地的故事时刻萦绕在核心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就像迷幻般引人追寻的“香格里拉”一样，伴随着西方世界对西藏由浅及深的认识，现实中的西藏问题在近现代成为中外各方力量关注的重点。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场景之下，中国人与西方人对于西藏有着差别巨大的心灵体验。在“大一统”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之下，作为大众的中国人从来就不认为西藏会成为一个问题，西藏的独特之处或许只是在于其宗教信仰与地理位置，其他诸如政治与社会的问题皆只是小细节而已。而西方人对于西藏则有着一种将猎奇与西欧式帝国主义观相互混杂的心态，正是这种复杂心态与近现代地缘政治的共同作用，最终使西藏内部的事件转化成某种意义上的“西藏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地对西方看待西藏的这种认识状态作价值判断，但是，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西方人对西藏的认识过程都是值得关注的，它反映了一个文化理解的问题，而了解这种文化理解的差异，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可行的中西间交流和理解的路径。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就提到了西藏。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对西藏描写甚多，但马可波罗本人并未到过西藏，故而大多为奇思异想。但是，“如果没有西方旅行家，那就绝不会有关于西藏的神话。西藏除了是一种地理现实之外，还是一种思想造物”³。西方人与西藏的真正接触应该始于传教士时代，即公元15世纪左右。葡萄牙传教士安夺德（Antonio de Andrade）在其《重新发现大契丹或西藏》一书中认为藏传佛教与罗马天主教会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在启蒙时代，当时的欧洲思想家们大多批评西藏的落后与野蛮，到了殖民时代，这种憎恶更加明显。

进入近代，随着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东亚的整个地缘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西藏地区也成为当时俄国与英国势力争夺的重点。与此同时，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在乾隆朝达到顶点之后逐渐弱化，清朝在西藏的管治权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未能贯彻到底，西藏地区的政治治理实际上处于一种“高度自运行”的状态。

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国家集团与国际阵营之间存在过激烈持久的彼此对抗，但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角色并没有被削弱，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冲突的催化剂，在诱使某些多民族国家裂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从国家控制的层面上看，现代国家治理的高密度与广覆盖，使这一时期的国家获得了远较以往国家形式的均质性。国家的边疆地区已被内化入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已经不存在大片无控制地区，在这种情形之下，原本属于国家内部事务的边疆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国际政治博弈当中，成为民族国家之间在政治框架论争中的一大焦点。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对边疆地区的历史状态究竟是宗主权还是主权，遂往往成为一个成王败寇的问题，论述历史的出发

¹ 本文最初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第7-14页），在收入本《通讯》时，作者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特此说明。

²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主要研究领域：边疆史、民族理论、中西交流史。

³ [法]米歇尔·泰勒著，岳岩译：《西方发现西藏史》（下），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1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2页。



点，往往不在历史之中，而在当下¹。在论及西藏时，西方在具体实践上往往就将之内化到对中国政治治理框架的批评与抨击当中，从而强化出了

一个可以随时刺激中国与制约中国的“加强版”西藏问题。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其《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中所指出的，西方在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中“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西方关于西藏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知识之中，至今没有清理。这一点对于欧洲人影响最大。其次是特定政治力量对于舆论的操纵和政治行动的组织。这一点美国关系最深。第三是对于西藏的同情混杂着对中国、尤其是经济上迅速崛起而政治制度极为不同的中国的顾虑、恐惧、排斥和反感”²。

表现在学科分类上，西方的藏学研究一直都自外于中国研究的范畴，这种分隔自然就影响了接受教育与从事研究的西方知识界与民众的视角。在笔者的学术经历中，每当与西方的同学交流，他们每每向笔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愿放弃这块地区？为什么西藏不能独立建国？”在他们看来，似乎在东亚形成像西欧一样的小国林立局面是一种美好选择。对此，笔者只能耐心解释：欧洲（尤其是西欧）自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就不再存在长期统一的大帝国，小国寡民的状态在欧洲历史中成为一种常态，欧洲近代多次政治强人试图一统欧洲的努力皆以失败告终（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以及希特勒时期的德国），这种历史经验使得国家“小而美”的理论在普通欧洲人心中根深蒂固³，这也是造成如今欧洲联盟始终跛足而行的原因之一；而在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况，一方面，持传统观念的历史编纂者们与普遍舆论皆以中华帝国的大一统为荣，而对帝国的分崩离析感到惋惜不已，国家统一已经内化为一种大众心态，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弱势局面与历史教训使得整体性的中华民族主义意识得到强化，进而强化了对国家一统的观念性认识。当笔者的德国同学在提及两德统一的历史时，笔者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心中的内在愉悦，这给笔者以强烈的震撼，因为在论及关于德国的问题时，笔者同学所持的关于欧洲国家“小而美”的观念就彻底让位于国家民族主义意识。这难道只是偶然吗？

“西藏独立”问题同样具有这种西方式的“选择性关注”的特征。这种特征不仅源自于现代国际政治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而且还是西方对西藏的“想象化认识”的一种逻辑性延伸。西方东方学传统下将藏学研究与中国研究区别对待的学术设置使得“西藏独立”问题在学理上成为一种既定的规则。西方研究中所弥漫着的强烈的“帝国-国家二元论”亦被当作是一种普世性的原则强加给他们未曾深刻感受的东方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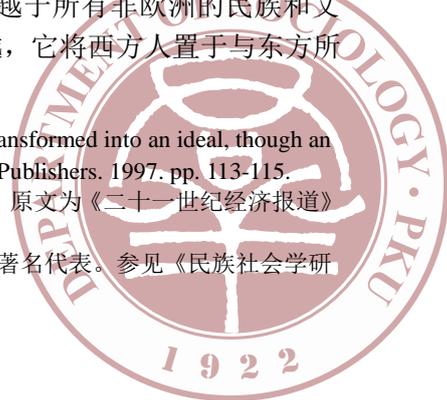
盖尔纳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 and Nationalism*）一书中曾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nationalism is primarily a political principle that holds that the political and the national unit should be congruent）⁴ 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one nation, one state）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实际上完全是为西欧的族群分布与国家态势而度身定制的，在被马克思（Karl Marx）称为“民族牢笼”的俄国就已经失效。但吊诡的是，这一原则依然被用于东方问题。解释问题的文化霸权感遂油然而生。正如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所言：“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东方学的策略积久成习地依赖于这一富于弹性的位置的优越，它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

¹ 柯娇燕（Crossley）即认为：“Tibet,” in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the Qing, was transformed into an ideal, though an ideal of tremendous importance. 见 Pamela Kyle Crossley, *The Manchu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pp. 113-115.

² 汪晖：《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原文为《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翔于2008年4月19日对作者所作的一次访谈记录。

³ 法国思想家厄内斯特·勒南所作的著名演讲《民族是什么？》就是这种观念的著名代表。参见《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13期。

⁴ 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可能发生的关系的整体系列之中，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¹。这种学术的傲慢深深契入西方对当代政治问题的诸多角度，并以一种被视为 universal 的方式成为先验的普世原则。但他们从未能系统论证过。美国没有西藏，欧洲没有西藏，有的大多是从片言只语构建出的一个欧美式的“西藏世界”²，并以这种“西藏世界”替代真实的西藏世界。

历史编纂总是在有意识的“记忆”与“遗忘”中塑造其俨然的逻辑顺畅性。作为无法脱离所在国家身份限制的个人始终在真实逻辑与国家话语之间苦苦挣扎。在某种情况下，保持某种历史的疏离感是必须的。当我们试图检视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的西藏政策问题时，海外华人学者恰恰具备了这种适当的历史疏离感，从而也有了展示一个更为真实的场景的可能性。林孝庭(Hsiao-ting Lin)的《西藏与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边疆：1928至1949年的权谋与民族政策》(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就进行了这一尝试。本书曾获得2007年国际亚洲学者协会(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奖。林孝庭(Hsiao-ting Lin)目前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中国边疆族群问题。本书是在其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力图通过对原始档案的探究重塑起国民政府时期的汉藏关系实景，并通过对汉藏历史关系与当时具体国际背景的进一步考察对当时的汉藏关系加以重新检视³。全书除了图表(Maps, Tables, Photographs)、前言(Preface)、致谢(Acknowledge)以及最后的后记(Epilogue)、注释(Notes)、人名与术语(Glossary of Names and Terms)以及书目(Bibliography)、索引(Index)，共分为四部分，分别为“背景(The Setting)”、“1928-1937年的战前时期(The Prewar Decade, 1928-37)”、“1938-1945年的战时阶段(The Wartime Period, 1938-45)”以及“1945-1949年的战后阶段(The Postwar Period, 1945-49)”。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的民族政策更多地被妄加论断，而不是建立在经验性的调查与严格的文献考索基础之上。在近年来，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的汉文档案文献的清理，尤其是蒋介石日记的整理出版，各地的学者们开始有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以检视至今依旧挑战着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的直接背景。而作者的研究也正是立足于对新出档案材料的利用之上。

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汉藏关系的历史背景。自清朝开始，通过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的内在联系，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确立起了强有力的政治联系。这种政治联系随着清朝在19世纪中叶的日渐衰弱而弱化，与此同时，英国的帝国势力在南亚地区大举扩张，在两种政治力量的冲撞过程中，西藏地区的自身政治意识开始有所表现，并以一种自认的“自主”力量开始某些跨国性政治活动。

作者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30年代初期的中国政治与疆域状况作了相关的背景性介绍，并说明了1928年之后国民政府内部的边疆政策规划结构，力图揭示出是什么真正形塑了国民党早期统治阶段的“中华民国”，以及如何在这一广阔的政治与组织背景中去理解国民政府的边疆事务。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于1929年正式依据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成立了蒙藏委员会，负责处理蒙古、西藏及其他各地区蒙古族、藏族事务，先直属国民政府，后改为行政院所属部会之一。这一组织安排，一方面表明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藏地区的主权领有，另一方面又凸显出西藏与藏族问题在整个国家事务中的特殊地位。而其具体行动也显示出国民政府在处理具体的西藏问题中所持有的灵活态度。在实践层面，南京国民政府管治大陆时期所采取的对藏政策与行动并不

¹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页。

² 这种美妙的“西藏世界”是在西方“神智论”(Theosophy)观念下对西藏的一种理想的、超现实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西藏是一片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依旧保留着精神纯洁性的和平美丽的地域，在这块地域之上到处都是充满着智慧的人。这一想象与近现代西藏的真实历史相去甚远，但却成为西方对西藏理解的一种想象性基础，深深植根于西方人的心中。

³ 对于此书，台湾《汉学研究通讯》第102期(民国96年5月号)曾载有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生王文隆的一篇简要书评，亦可参酌。



像政府声明所表现的那般刚性，而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灵活应对、多有妥协。政策宣示与具体实施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种现象也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

事实上，正如法国东方学家亚历山大·达维·耐尔（Alexandra David-Neel, 1868-1969）所称的：“许多世纪以来，西藏的历史就与中国的历史密不可分。无疑，藏族与汉族自古以来就在战场上和粗野的交涉舞台上不断较量过，双方都不乏诡谲与狡诈，但彼此却从未闹到要一刀两断的地步”¹，中国的民族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但却不至于酿成激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看似刚性和一体化的政府对外宣示的表面下，对于国内各族群的处理始终采取灵活多变的态度。观察目前大陆对藏问题也应该考虑到这一层面的问题。

1927年后，随着国民政府对全国统治秩序的确立，西藏地方与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开始密切起来。而几乎与此同时，汉藏边界之间爆发了自1917-1918年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这一时期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大致处于和平建设时期，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不再构成致命威胁，在中央政府试图收回地方权力的过程中，通过诸多不伴随相应实际行动的政策性声明以宣示对全国的主权。在处理西藏问题方面，国民政府周旋于西南军阀势力以及英国之间，形成一种时紧时松的三角关系格局，如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所言：“中华民国尚无力彻底控制西藏。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国都是欧洲列强的盟国。无论是西方列强还是西藏，它们都明显不能够宣布西藏独立”²。这成为作者在第二部分的关注重点。作者指出，先前关于汉藏关系的研究认为国民政府从1928年起就试图重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如果考虑到国民党对国家的重新统一、反帝国主义以及反民族奴役以及建立一个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的不懈追求的话，那么如果说他们没有让西藏回归的构想就显得令人惊异。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认为国民政府在统治的初期是否真正希望西藏会无条件地和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值得讨论。而国民政府所执行的“边疆政策”（frontier policy）背后所隐藏的较之单纯的边疆与民族问题更为复杂的政治考量。在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内部一体化与国家构建的背景下，对汉藏关系的探究能够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中的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有新的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藏问题格局则呈现出另外一种态势。作者在第三部分指出，随着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西迁以及西南军阀的抗日举动，中国西南地区逐渐被中央政府所牢牢控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迁时期的国民政府对于西藏问题反而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态度，在实际上默许了西藏地方政府设置“外交局”，同时为了中印公路的顺利修筑，亦默许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当局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进行谈判。而在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西藏地方政府过于独立而转投轴心国集团，国民政府与外部的英国等力量又对西藏地方政府施加了重大的压力，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通过扩充驻藏办事机构的机会强化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控制能力。随着美日之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华民国位列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四大盟国之一，国民政府遂有了国际支持以重申对边疆地区的主权。作者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蒋介石曾试图通过军事行动以彻底解决西藏问题。国民政府在战时对西南地区控制的加强源自于对统治安全与生存的需要。这种政治行动较之孙中山时期只具观念轮廓的中华民族主义要远为重要得多。

本书的第四部分则主要论述国共内战时期的边疆状况与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转变问题。国民政府于1949年8月匆匆举行的班禅额尔德尼坐床仪式一方面在法理上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但在另一方面，随着班禅额尔德尼之后不久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承认，使得原先由国民政府所具有的法理上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在实际上和平转托给了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新的北京领导人打算对喇嘛和活佛（至少对较为显贵的喇嘛）仍旧采取这种敕封。他们在敕封达赖喇嘛和

¹ [法]亚历山大·达维·耐尔著，李凡斌、张道安译，《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编印，第2页。

² [法]石泰安著，耿昇译，王尧校，《西藏的文明》，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编印，第85页

班禅喇嘛时已经沿袭了传统的作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高的政治姿态”¹。这一事件使大陆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得以在 50 年代初与西藏地区的达赖喇嘛当局达成和平协定。而在某种程度上，目前大陆中央政权所面对的西藏困局在很大程度上继承自南京国民政府管治大陆时期的各项政策与行动。南京国民政府在对藏政策与行动方面既有成就，亦多有失误，各种措施实施并不比现在的大陆中央政府措施更好。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认为，国家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这确实是对传统国家理论的一种突破。但是，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我们往往以一种颠倒了的逻辑进行，在这种逻辑中，国家成为想象共同体的唯一途径和结果，任何关于共同体的想象都被贴上了型构国家目标的标签。“就如处于支配性国家的背景中一样，民众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遭到人民的同一性和同质性的否认”²。中华文化中所惯有的对于政治性的前置使得诸多的研究工作了无意义，而同时，西方在对这些边疆问题上的作壁上观与指摘也使研究方向发生了偏误。作者作为身处海外的华人学者尝试着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然，本书尽管在材料上充分发掘了诸如伦敦大英图书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中英文资料以及位于台北的国民党以及外交部档案，但是可能是由于条件所限，对于中国大陆地区诸如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的相关档案材料则未能加以利用，更未能使用相关的一手藏文资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后续的研究应当可以在这方面加以强化与深入。

“西藏问题”远不仅仅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它是一个西方将自己的帝国主义式的承认政治——即一种以民族国家为主题单位的承认体系——扩张到亚洲地区时形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³。一方面，如今所有的西方大国都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国际法的意义上说，西藏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西方国家内部所存在的巨大的社会多元化使得西方民众基于“想象的西藏图景”而对西藏问题的某种误导性支持在西方民主的背景下极大地消弭了国际法层面对西藏地位的清晰定位。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所弥漫着的“帝国-国家”二元论的分析路径使中国的印象极为趋近于业已解体的苏联，其一般民众心目中也必将崛起中的中国看作是二战后咄咄逼人的苏联，但是，中国的民族结构并不是俄国-苏联模式的“套娃”结构，而是多民族以及民族内部次生群体的“大杂居、小聚居”，西藏与藏族也概莫能外。事实上，要理解“西藏问题”，我们还是应该回头去重新检视西藏地区的历史，去探究这一地区是如何组织社会活动、建立地方政权以及宗教网络的，而其中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打破将西藏总体化的认识模式，避免以近代和当代的西藏政治宗教状况来套用到对其历史的分析当中，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个地方并不只存在一个神灵，也有着喇嘛教（藏传佛教格鲁派）之外更多的教派与共同体的声音，而发现这些声音，就能使我们破解西方“东方主义”偏见以及“选择性关注”的政治策略，从而更好地实现中西方在西藏这一问题上的彼此交流与理解。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李健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¹ [法]亚历山大·达维·耐尔著，李凡斌、张道安译，《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 1985 年编印，第 4 页。

²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8 页。

³ 这一观点参考了汪晖在《东方主义、民族区域自治与尊严政治——关于“西藏问题”的一点思考》一文中的部分叙述。

